

本书回顾冷战较量美苏两大国的目标和恐惧，
凡亲历者和重大决策参与人，至今犹惊心动魄

冷战史

遏制与共存备忘录

〔美〕雷蒙德·加特霍夫 著

伍牛 王薇 译

A JOURNEY THROUGH
THE COLD WAR
RAYMOND L. GARTHOFF

新 华 出 版 社

冷战史：遏制与共存备忘录

〔美〕雷蒙德·加特霍夫 著
伍牛 王薇 译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冷战史:遏制与共存备忘录/(美)加特霍夫著;伍牛,王薇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7
ISBN 7-5011-6222-0

I. 冷… II. ①加…②伍…③王… III. ①美苏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②美国对外政策—研究 IV. ①D819②D871.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46784 号
图字: 01—2003—3522 号

A Journey through the Cold War

by Raymond L. Garthoff

Copyright © 2001 by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Copyright © 2003 by Xinhua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简体字版专有权属新华出版社

冷战史:遏制与共存备忘录

[美] 雷蒙德·加特霍夫 著

伍牛 王薇 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邮编:100043)

新华出版社网址: <http://xhcbs.126.com>

中国新闻书店:(010)63072012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照排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880毫米×1230毫米 32开本 13.375印张 320千字

2003年8月第一版 2003年8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6222-0/D·987 定价:30.00元

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010) 65895562 65897685

序 为什么写这本回忆录

我的职业生涯，包括我成年以来的大部分岁月，都是与冷战密切相连的。此外，正如我下面将简略叙述的那样，我的经历涉及安全领域许多方面的分析工作、幕僚工作和外交使命，这包括了情报收集和分析、处理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关系、与苏联的军备控制谈判和更广泛的东西方外交以及西方联盟内部关系。这样的经历使我处于各种有利的地位，能观察到冷战历史的方方面面。

虽然任何回忆录都只能是以政治和历史进程的一个片段为依据，而编写历史则仍然需要以档案文献资料为主要依据，然而写回忆录的人曾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身处政策过程的内幕，能够对特定的事件或事态发展提供更充分的说明。身处内幕而又有广泛经历的观察家的回忆，可以从侧面对历史提供一些新的趣闻，也许还有助于理解一些更广泛的问题，其角度不同于那些最高层人士的观察，可作为对后者的补充。我除了自己的直接经历和观察以外，还多年研究美苏关系的发展史，就冷战的若干方面写过几本书。不过，我这次写回忆录，仍是从一个内幕人的有利地位，或者说一系列的有利地位出发，谈冷战往事。虽然这比起常规的历史分析来还不够全面，但却是从一个不同的方面，即某些事件的身临其境者的亲身经历和观察，来看待美国的政策这一主题。

在这篇简短的序言中，我将简略地说说我的职业生涯，当然只是简述一下我的经历和我曾经身处过的一系列有利地位，至于

我在那些地位的所见所闻、所接触过的具体事件，则放在回忆录正文中再加以叙述。

从1945年到1950年，我先后在普林斯顿大学和耶鲁大学勤奋攻读国际关系课程，尤其是与俄国有关的课程。因此，我的学业成形的阶段恰好与冷战的成形时期相吻合。

从1950年中期到1957年中期，我在兰德公司工作，任务是研究和分析苏联事务。兰德公司当时还是一个新型的研究安全问题的“思想库”，其调研内容既有公开的，也有保密的。在那里，我对研究苏联的军事学术有了一个难得的入门机会，掌握的专业知识在此后多年中均有助于我参与撰写这一方面的一些书和论文以及在一些军事院校等场合发表演讲。在1957年中期，我又有幸获得当时很好的一个机会，到苏联国内走访了两个月，然后转入政府部门工作。

从1957年末到1961年秋季，我在中央情报局（CIA）各国国力估计处工作，具体职责是对苏联外交政策和安全政策草拟情报文件。在中央情报局工作的这一时期，我的“掩护身分”是国防部的“外事顾问”，这使我得以继续公开论述苏联的军事和政治问题以及美国的军事政策。我的掩护身分还从另外一个方面使我受益：1959年，我得到两次非常有意义的赴苏联出差的机会，一次是作为当时的副总统尼克松访苏的随从人员，一次是为约翰·麦科恩率领的原子能委员会代表团当翻译。这两次出差使我得到了两个方面的亲身经历，即收集“公开”情报，以及将情报的收集和分析与政策的应用结合起来，使二者不再脱节。我还完成了一项漂亮任务，成功汇报了瑞典一个访苏军事代表团获取的重要情报。这一时期，中央情报局的局长艾伦·杜勒斯曾给我交待了一项任务，即对美国在苏军中搜罗到的最重要情报员奥列

格·彭科夫斯基上校^①进行评估。然而，我在中央情报局的主要工作始终是分析和评估苏联对外政策和安全政策方面的情报。

尽管我在中央情报局的四年工作很有意义，但在肯尼迪就任总统时，我急于更直接地参与政策制定。这时我可以从两个职务中挑选一个，一是国防部的国际安全事务署的政策规划员，另一个是参加国务院新成立的政治军事事务班子（G/PM）。我选择了后者，担任苏联集团政治军事事务特别助理。在这个岗位上，我干了六年多，负责办理的事情不少，其中包括在军备控制和裁军事务方面直接为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当参谋，在当时绝对保密的一个跨部门的处理航天侦察政治与安全事务的委员会担任执行秘书，在有限范围内参与处理1961年的柏林危机，以及直接参与处理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我还从一开始就密切参与了争取苏联领导人同意举行美苏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并且在第一次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全过程中担任美国代表团的主任参谋和国务院高级顾问。

与此同时，尽管在1969年和1970年大部分时间里，我办理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事务，但是从1968年起，名义上直到1970年秋季为止，我还担任了美国派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的使团的政治军事事务顾问。这让我有了更多的机会参与盟国间的协商和盟国外交。这也使我处于一个有利地位，来观察东西方之间外交关系的演变。

除了1969年11月至1973年1月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代表团任职以外，从1970年中期至1973年中期我还担任过国务院政治军事事务局的副局长。从1973年到1974年，我担任国务院的高级进修班主任，还到几个国家（德、法、意、英和苏联）就政策规划方式做采访，在此基础上起草了一份比较调研报告。从

^① 彭科夫斯基（Penkovsky），有的资料中曾译作“佩尼科夫斯基”或“潘科夫斯基”。本书第七章中对此人有详细论述。——译注

1974年到1977年，我担任国务院驻外机构事务局的高级督察，曾率视察组到一些国家（包括欧洲的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近东的以色列、伊拉克、叙利亚和约旦，亚洲的泰国和菲律宾，中非和南美的几个国家，以及加拿大），视察我们的使馆的工作以及驻外人员对美国与驻在国关系的处理情形。在每一地都要逗留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对几个最大的使馆的视察均长达三个月。这些视察使我得以非常密切仔细地了解各驻外使团的业务和整个驻外机构事务的运转，还在一定程度上更广泛地了解美国对外关系，包括国务院之外另一些部门驻外机构的运转情形。我还对国务院内部高层工作运转情况作了一次敏感的调研。（这里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由于我历次视察发现了一些问题和提出了相应建议，国务卿亨利·基辛格的最初反应竟是要求撤销整个监察署！）

从1977年到1979年，我担任驻保加利亚大使，这个差事相对说来较平静，然而它让我有机会实地观察一个共产党国家的运转以及苏联与东欧的关系（还有美国与东欧的关系）和巴尔干地区的外交活动。到1979年底，从年龄和工龄来讲，我有资格提前退休，就决定离开政府机构，从而将全部时间用于学术研究。

从1980年到1994年，我在布鲁金斯学会当高级研究员，主要是研究冷战后期的美苏关系，并就此发表了两本著述。在布鲁金斯学会的这些岁月中，我访问过苏联十来次（还访问过中国和古巴）。我参加过一系列国际会议，与苏联和美国的外交官及其他官员保持了联系，到20世纪90年代初还得益于查阅前苏联共产党在莫斯科的档案。此外，我还通过其他方式对我感兴趣的的相关学术问题作了一些研究。因此，在冷战的最后十年，我虽然不再供职于政府部门，却仍然积极关注着事态的发展。

以上就是我的简历，我正是根据这些经历编写了这部回忆录。当然，在美国当今外交关系史以及冷战历史中，有许多重要

的领域是我未曾涉足过的，我对它们几乎没有或者完全没有直接的体验（这包括经济关系、越南战争、美国与中国和第三世界的关系等等）。对其中某些事情，我只能谈一点观感。然而，我写这部回忆录的目的并不在于追求全面，而只是想要就我直接经历和了解的那些事件和情况，对人们已知的史料作一点补充。

回忆录能起到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让人们注意到当年流行的理念和见解，通过讲述轶事、反思和分析，帮助人们重新看到当年为什么会有那样的观点、立场和行动，因为过去有些观点、立场和行动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也许是难以理解的。这也许正是回忆录所能作出的最重要的贡献，能让读者移情地了解往事。这样做的目的既不是批评也不是辩护，而只是争取理解——尽管在反思中也许会作些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及辩护。

写回忆录的一个有利之处，是有机会根据我在政府部门中工作时的亲身经历和观察，对事物作出我个人的判断。在冷战结束之后再回过头来重新评价美国的安全政策，这总的说来是我们大家面临的一项全新任务，也是一个机会。回忆录可以为完成这一任务提供一条补充途径，对比较常规的历史学和分析评估有所裨益。现在大家都在努力重新思索当年安全政策的得失，不只是为了研究过去，而且也是着眼于未来，而回忆录可以给我们的磨房送来新的谷粒。经历过往事的人反思过去的经验教训，可以得出对将来仍有价值的结论。

我的回忆录主要是聚焦于美国的政策制定，尤其着重于美国当时对苏联这个敌手的见解和判断，以及美苏之间的互动。我对美苏关系史的研究著述一向注重这样的见解和互动，但在这部回忆录中，根据冷战过程中的亲身经历回顾美苏关系，则是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这样做。当年，我是一个政策分析员和情报分析员，以后参加了谈判，还与当代苏联人士有过其他往来（这种往来今天仍在继续，因为我常与一些前苏联高级官员一起回顾和分

析往事)，因此，我一直有许多机会来观察和体验美苏之间的互动。在回顾美国的政策制定过程及美苏互动情形时，有一个反复得到确认的重大结论，这就是我们在采取行动时很难想见这些行动对于苏联这个敌手的想法以及由此而来的他们的决心和行动会产生何种影响。（当然，反之亦然。）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的重要性被严重低估了，有时即使是承认了，也很难把它用到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去。它太容易遭到误解，或者被误认为是软弱的表现，是缺乏坚定不移追求美国利益的精神，然而，要真正客观地、顺利地推进自己的利益，就往往需要正确地理解别人的利益和想法——对于一个敌手尤其是如此，因为彼此利益相左或相悖。这样的结论，在分析的基础上当然也可以得出来，可是通过亲身经历的感受会体会得更深。

总之，这一部回忆录是叙述了一个人的冷战之旅。写它，是因为我相信它对读者来说是有兴趣和有价值的，读者之中的多数人不曾生活在我那样的岁月，他们当中谁也不会像我那样在美国安全系统内部经历那样一些事情。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我希望我能如实地按照我的所见所闻，唤醒人们注意我们历史之中不久前刚刚翻过去了的这重要一章，把它看做是“活”的历史，会觉得这比读一般历史书时的感受更有趣一些。

目 录

序 为什么写这本回忆录	(1)
第一章 冷战开始：成形的岁月 1945—1950	(1)
第二章 从思想库看世界：兰德公司的苏联问题专家	(9)
第三章 解冻：观察斯大林之后的苏联	(25)
第四章 中央情报局及情报分析和国力估计	(41)
第五章 五角大楼的“外事顾问”	(66)
第六章 访问苏联的情报旅行	(77)
第七章 间谍游戏	(99)
第八章 国务院：肯尼迪年代（一）	(118)
第九章 国务院：肯尼迪年代（二）	(135)
第十章 古巴导弹危机：冷战的转折点	(162)
第十一章 国务院：约翰逊年代	(184)
第十二章 东西方关系的外交	(210)
第十三章 战略武器谈判和反弹道导弹条约	(237)
第十四章 在美苏关系中发展缓和	(279)
第十五章 视察美国驻外使团工作	(296)
第十六章 驻保加利亚大使	(307)
第十七章 20 世纪 70 年代缓和的衰退和没落	(333)
第十八章 目睹冷战的结束：1980—1990	(348)
第十九章 对冷战的反思	(391)

第一章

冷战开始：成形的岁月 1945—1950

冷战究竟是从何年何月开始，其说不一。它出现于 1945 年至 1947 年之间。也许不无道理的说法之一是，1946 年 3 月 5 日，前英国首相丘吉尔在美国密苏里州富尔顿发表演说，宣布一道“铁幕”已降临于欧洲大陆，表明冷战业已开始。在丘吉尔演说之前不到一个月，苏联领袖斯大林将两次世界大战都归咎于资本主义，暗示了苏联和西方之间将存在持久的冲突。而两星期之后，美国驻莫斯科临时代办乔治·凯南发回了他那封在后来出了名的“长电报”，分析苏联政策的缘由，其词语为美国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战略奠定了基础。有些持不同意见的历史学者则认为美国 1945 年 8 月使用原子弹就预示了冷战的来临，说美国此举当时从打败日本的军事上看并不是必要的，其意图是抬高美国在战后对付苏联的地位。更有道理的一种看法则是，有些历史学家指出，同盟国战胜了轴心国之后，这一成就引出了战胜国彼此之间不可避免的对立。无论如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数年之间，冷战就出现了，一边是苏联及其卫星国构成的“东方”，另一边则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

那几年正是冷战成形的岁月。它们也是我职业生涯成形的时期。不论冷战开始于哪一天，当时我都是在上大学。从 1945 年 6 月到 1948 年 6 月，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念书，随后我上了耶鲁大学研究生院，直到 1950 年 6 月。在普林斯顿（我到那里比乔

治·舒尔茨晚6年，比詹姆斯·贝克早4年)，我就读于伍德罗·威尔逊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进耶鲁则是进修国际关系，重点是研究俄国。从我少年时候起，现代史和世界政治就一直对我有吸引力，所以，我就很自然地将这一兴趣应用于战后出现的主要挑战，即美国与苏联的关系。在两个大学期间，我研读了许多科目的课程，重点是现代史、外交史和俄国历史以及国际关系，对政治学读得不多，对经济学则接触得更少了。

这本回忆录不是自传，总的说来将很少提及我的个人生活。然而有一点似乎是例外，这就是在以下的几段简单说一下我早年对世界事务之所以感兴趣的背景。

我是1929年3月26日出生于埃及的开罗。我父母是美国艾奥瓦州人，但在20世纪20年代的后五年，我父亲是开罗的美国大学的财务主管。从童年到上中学，我是在美国国内的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德里亚，当时我父亲在华盛顿的美国农业部工作（后来有几年他担任了国际小麦理事会美国代表，随后担任该理事会主席）。我虽然没有生活在海外，但家庭环境中关注世界事务的气氛是很浓的。我在邻近首都华盛顿的地方长大，这也促成我关心国事和天下事。

我于1945年毕业于乔治·华盛顿中学，大约40年后，该校于建校50周年时给四名老校友授奖，我是其中之一，是表彰我在国际事务中的工作成就，另三位受奖者是一名字航员，一名荣获普利策奖的作家，以及校友中名气最大的电视人物威拉德·斯科特。

1945年6月，我进了普林斯顿大学，当时是按战时的学制，一年有三个学期，享受奖学金。所以，我是以一名16岁大学新生的身分欢庆了日本战败投降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在随后的三年则看到了冷战带来的那些事件。作为一名攻读世界政治的大学生，我比大多数同学更关注全球各地的事态，但是我们当时

并没有完全懂得冷战意味着什么——我相信当时的大人们也没有充分意识到这是怎么一回事。一方面，当时那些事距离我们的日常生活还不那么近；另一方面，当时只有最尖锐的对峙，例如1948年的柏林封锁及空运，才让人想到冷战有可能变成热战。直到1950年爆发朝鲜战争以后，“热战”的危险才朦胧浮现。

原子弹轰炸广岛和长崎时，我还是刚进大学不久。这种新式武器的可怕威力预兆了一个危险的未来，然而在当时看来，这是迫使日本早早投降的重要因素之一（今天我仍然对此深信不疑）。随后，当冷战双方敌意加剧时，它又是维持力量均势的一个关键因素。但是它不是制造这种敌意的首要因素。普林斯顿大学在研制原子弹的物理研究方面起过重大作用，有好几位教授和毕业生参加了曼哈顿工程，后来普林斯顿大学在这方面继续作出了贡献。我在1945年—1946年期间曾有幸目睹新原子时代的两位巨人玻尔和爱因斯坦的风采。

当时我的政治倾向是温和自由派。我第一篇“公开发表”的论文是1948年5月刊载于自由派校园杂志《新世纪》，标题是《对个人权利的挑战》，内容是反对当时刚露头的麦卡锡主义（这个名词那时尚未出现）。我参加了新成立的世界联邦主义者联合会，它的全国领导人之一是退伍老兵科德·迈耶。若干年以后，当迈耶在中央情报局主持国际组织部工作、稍后又领导全部秘密活动时，我跟他直接交往过。

在1946年以前，我对俄国或苏联或共产主义都没有什么特别兴趣。早年，关于苏联在世界上的作用，我记得只有两件事给我留下了印象。一件是1939年—1940年冬季苏军入侵芬兰，给我留下了坏印象。另一件是俄国人抵抗德军的进攻，与我们结成了反纳粹同盟，给我留下了好印象。战后，苏联的行为使我（以及别的许多人）深感震惊的最早事件之一，是苏联军事情报官员伊戈尔·古任科1945年9月在渥太华叛逃后透露，苏联一直在对

我们搞间谍活动。我还读到过另一些叛逃者的自白，例如维克多·克拉夫琴科的《我选择了自由》。最有意思的一本书是亚瑟·凯斯特勒的《中午的黑暗》。

冷战初期我经历过的对民众最起动员作用的一件事，是1947年围绕着马歇尔计划而展开的大辩论。我记得只有这件事促使我们许多人上街游行，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我是赞成者之一。马歇尔计划是面对冷战迈出的重要一步，但它的意义首先在于美国拒绝了孤立主义，投身到世界之中。接着宣布的杜鲁门主义不只是具体援助希腊和土耳其，而且实际上还确立了总的遏制政策，但是就我记得的情形而言，它在国内引起的争议要小得多。

在我的毕业论文中，我探讨了苏联政策的两面性，具体事例是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初苏德两国的军事勾结，它显示出苏联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俄国民族利益二者混到了一起。我的正式课程包括近代外交史、国际组织、国际法、国力基础等等，大都集中于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当然也论及一些当今事件，例如联合国的成立、讨论欧洲战后和平条约的那些外长会议，等等。我学的东西主要是“现实派”政治学，强调实力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其经典课本包括E. H. 卡尔的《二十一年危机（1919—1939）》，还有当时新出版、至今仍屡屡修订再版供大学生学习的汉斯·摩根索的《国家之间的政治》。

我那时急迫地想投身于国际政治的现实之中。我从来没有想过经商，对国际商务也不感兴趣。我期盼着加入美国的外交人员队伍。

在我以优异成绩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和进入耶鲁大学研究生院之间的1948年夏季，我到西欧旅行了一圈，头次看见法国和意大利有活生生的共产党人参加竞选。我毫不怀疑他们得到了莫斯科给的经费，只是我当时不知道他们在意大利的对手得到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给的经费。这一次旅行开阔了我的眼界，对我的学

习很有帮助。

我很喜欢我在耶鲁的进修课程。到1950年6月,我学完了必修的课程,博士考试也通过了,只缺一篇博士论文,它可以在离校后再写。虽然我在普林斯顿大学时已重点研读了俄国有关的课程,但我在那里还没有学习俄语。耶鲁大学在战争期间已与另几所大学一起率先采用了新的外语教学方式,大量聘用了相关的外籍教师进行强化训练。我在进修学校一面学我的进修课程,一面学习俄语。在第一学年我就学完了强化的俄语一年级课程,暑假期间突击学完二年级课程,所以在第二学年我已跳级到俄语四年级课程。到1950年,我的俄语已能用于读和写,口语也相当流利。

在学习俄语以及随后研究俄罗斯文化的过程之中,我结识了不少“白俄”侨民,他们当中有些人是在俄国革命和内战之后直接流亡到美国,有些人则是先在欧洲或中国生活多年然后转来美国。我结识的俄国人当中,有一位是杰出的哲学家尼古拉·洛斯基,还有一位是天才的飞机和直升机设计师伊戈尔·西科斯基。我还认识了几位新的DP(流亡者),他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离开苏联,辗转而来。

最重要的是,我结识了我未来的妻子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瓦西利耶娃。她出生于拉脱维亚的一个白俄家庭,1939年12月,当战争来临、苏军即将接管拉脱维亚之际,她全家人来到了美国。她的父亲是俄国贵族出身,在沙俄军队、后来内战期间又在白军中当过军官,到美国后当俄语教员,是我在耶鲁最敬重的俄语教师。

在普林斯顿时,我当过步枪手枪俱乐部主任,结识了该校后备军官训练队负责人福克斯上校。经他安排,我在1947年对后备军事情报课程有所了解。1949年,我在耶鲁大学进修时加入了后备役军事情报组。我还动员了一位教授参加这一活动。我所在的单位叫做第469战略情报小组,任务是利用图书馆资料研究

苏联的军事潜力，主要是为了培养我们的调研能力，不过也为建立庞大的苏联资料库作一点点贡献。这个小组的领导人是一位年轻的陆军后备役上尉戴维·查夫查瓦泽，他出身于沙俄格鲁吉亚皇亲贵族，战时曾在美国空军服役，担任美国援俄军事供应事务联络官。他和我还都参加了耶鲁的一个非正式的俄语合唱团。后来他到中央情报局，长期从事秘密情报个案研究。有一次我们小组听过一位情报专家讲课，他就是谢尔曼·肯特，战前是耶鲁教授，战时去战略情报局工作，回耶鲁不到一年，又去了新成立的中央情报局。我当时完全不曾料到，几年之内，我就会到中央情报局在他手下工作。在战后返回耶鲁的这段短暂时间里，他写了一本小册子谈战略情报，被用作标准教材。

1948年，我曾与当时新成立的中央情报局有过联系。跟我面谈的那位官员表示我可以马上进该局工作。我说我想先完成研究生院的学习，他表示同意，说我以后随时可去。

我跟国务院几位负责苏联事务的官员也接触过，其中有的人，即比尔·克劳福德、迪克·戴维斯和杰克·麦克斯威尼，后来成为我的同事，还到东欧国家当过大使。他们鼓励我先完成学业再申请到外交部门工作，还建议我读读《外交季刊》刚发表的一篇文章。那是国务院的乔治·摩根用笔名“Historicus”发表的一篇分析意识形态对苏联外交政策影响的文章，它虽然不如乔治·凯南用笔名“X”发表的那篇文章轰动一时，但论述得也很精细，有学术深度，其分析方式正是当时我研读的内容。摩根在国务院外事部门工作，是一位哲学博士，写出这样的文章很不简单，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很喜欢我在耶鲁攻读的功课，尤其是其中的外交史（老师是哈约·霍尔本和乔治·维尔纳德斯基）、政治学（老师是塞西尔·德赖弗）、国际关系（老师是伯纳德·沃尔弗斯、弗雷德里克·邓恩和威廉·福克斯）、安全事务研究（老师是伯纳德·布罗迪和克

劳斯·克诺尔)以及苏联问题研究(老师是弗雷德里克·巴洪和内森·莱特斯)。对我思想最有影响的,大概就是沃尔弗斯教授讲授“现实政治”的课程。在普林斯顿时,我就受过地缘政治研究方面的另一位名家哈罗德·斯普劳特的教诲,对此有所领会。耶鲁大学有几位教授在1946年就发表了有关核武器影响的一本论文集,即布罗迪主编的《绝对武器》。

我在耶鲁的这两年,即1948年秋至1950年中,冷战已形成了持续对抗的局面。最富有戏剧性的事件是1948年—1949年苏军封锁柏林和美国实施空运,但这场危机的解决表明,虽然双方的对峙继续存在,冲突却不至于失去控制。1949年西方国家签订北大西洋公约和成立北约组织虽肯定意义重大,但在当时人们并不认为美国会因此而在欧洲保持大规模的军力,觉得这主要是巩固西欧政局的一步。

人们感到冷战预兆不祥,不仅是因为看到敌意会长久不散和害怕共产主义,而且还因为斯大林展现出一种神秘莫测、令人恐怖的形象。苏联和斯大林手下的国际共产主义似乎构成一种空前的威胁,比希特勒的威胁更严重。

冷战在当时不但是主宰世界政治的因素,而且还反映出我们的国家和价值观所受到的最大威胁。它实质上看来是自由世界与极权主义共产主义世界之间的冲突。对于美国和西方而言,冷战构成了最大的挑战。在我们这些当时进入国际关系领域的人看来,我们显然要为冷战消耗毕生的精力。许多人还为它献出了生命。后来,世界起变化,冷战自身也起变化,它的挑战也就随之改变,然而这是多年以后的事了。在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我们都是聚精会神于怎样最有效地把冷战进行下去。

就冷战的出现来说,苏联巩固它对东欧的控制,具有最重要的意义。然而当时最引人注目的事态发展是共产党夺取了中国大陆的政权。它也引起了美国国内政界最激烈的一场辩论。这时,